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六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三六期（zk1606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1966年的清华文革——中央文革“缺席”考	华新民
【痛定思痛】	《我们忏悔》前言	《我们忏悔》编委会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六）	钱理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1966年的清华文革——中央文革“缺席”考

· 华新民 ·

许爱晶（即韩爱晶）所著的《清华蒯大富》〔1〕是一本了解文革历史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的作者和书的主人公都位列毛泽东所谓“五大学生领袖”，也是仅存的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中影响最大的人物。由于他们在文革初期与中共高层有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他们的回忆提供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是他们的同龄人，是北京一所政治上处于边缘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个普通学生，虽然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里经历了文革的最初几年，对这段历史了解的广度和深度是远远不能同这些学生领袖相比的。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所叙述的学生领袖和中央高层活动的内幕资料，同自己当年所知的公开事件和道听途说两相对照，常有一种发现新大陆和恍然大悟的感觉。它不仅给我提供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也澄清了多年来一直盘旋在脑海里的混乱和困惑。本文要说的是，它帮助我们澄清了周恩来、中央文革与清华大学在文革最初的半年时间里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如果从谁是掌控运动的主导者这一角度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以1968年7月27日为分界线，在这一天，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人开进清华大学制止绵延百日的武斗，在全国开始了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运动新时期。对于清华大学本身来说，也开始了毛泽东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掌控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从1966年6月开始，掌控清华大学运动的主导权发生了一系列的转移，大体上说，转移的路径和代表人物就是：校党委（蒋南翔）—工作组（刘少奇/王光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当然，归根结底来说，在井冈山兵团和蒯大富后面的，是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他们背后的毛泽东。本文要讨论的是文革主导权从工作组到井冈山兵团的转移，也就是从刘少奇/王光美手里转移到毛泽东/江青手里的过程，这个转移是蒯大富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帮助下实现的，时间上说，就是1966年的下半年。

据《清华蒯大富》（以下引文如出自本书，不再注明书名）记载，在这段时间的倒数第二天——1966年12月30日，江青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江青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175页）也就是说，“中央”曾经有过纪律，不准中央文革进入清华园。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人心中，中央文革、江青、清华大学、蒯大富这几个名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蒯大富的上述回忆却显示，中央文革在清华大学的文革初期是缺席的，有近半年的时间中央文革是不能进入清华大学的。这条禁令是真的吗？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时候生效的呢？它对清华大学的文革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清华蒯大富》的记载，中央文革曾经派人进入清华园同蒯大富接触过，那是7月22日，即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当时工作组尚未撤出学校，清华大学基本上还是在刘少奇/王光美的掌控之中。蒯大富回忆说：“7月22号，工作组那个管我们班的女工作人员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就是新斋一楼。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两位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的意见。”中央文革当时还没有在媒体上亮相，蒯大富不认识这两个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他刚刚被允许自由行动，还不知道工作组放他出来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为了勾引他的后台。所以他对王力和关锋的应对十分谨慎，写了三页纸，简单回顾过去二十多天的情况。蒯大富说：“他们俩看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啊，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88页）

据王力回忆，他和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是毛泽东所派，他们去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2）蒯大富的回忆和王力的稍有出入：蒯说他在7月22前就自由了，王说他们见面之后蒯才获得自由。

那么，王力和关锋是怎么知道到清华找蒯大富可以了解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呢？换句话说，中央文革是怎么知道作为清华头号“反革命”的蒯大富这个名字的呢？我们今天对于中央文革在那一段时间里如何收集北京各学校的文革动态所知甚少，但是陈伯达当年的秘书王文耀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据王文耀回忆，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带领一行人微服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被王光美发觉后请到会议室里，向他们介绍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王光美说：“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3）陈伯达的这次清华行，看来是中央文革第一次对清华大学不动声色的实地侦察。对王光美的介绍，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不过，他肯定记住了蒯大富这个名字，后来王力和关锋的指名约谈恐怕与此有关。

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活动的最早的纪录了。从那以后，中央文革并没有后续的行动。在1966年7月22日和12月30日之间的五个多月里，笔者也确实查不到中央文革到清华园活动的记载和回忆。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万润南谈到江青时说：“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4）所以不许中央文革涉足清华园的禁令——这个真有，但是中央文革在清华大学文革中缺席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应当是在1966年7月22日之后的某一天开始生效的。

这段中央文革不进清华园的时期，至少在初期，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一直在周恩来的掌控之下。正如唐少杰所说“在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转变上，周恩来的作用仅次于毛泽东，甚至这种作用更加直接、具体和关键。”〔5〕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开始密集地约见清华大学运动涉及的各方人员。《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一书的编者在刊载了被周恩来约谈的蒯大富等人的回忆之后，在附记（112页）中根据“一份可信度极高的资料”列出了周恩来在1966年7、8月之交跟清华大学有关的活动日程：

7月29日，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让周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7月30日中午12时约清华工作组谈话。下午3时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下午6时一刻约另一批清华同学谈话。

8月1日晨2时到清华约蒯大富等人谈话。上午11时半约王光美同志谈话。下午6时半与蒯大富谈话。

8月2日晨1时与叶林谈。上午11时约见王光美同志。晚7时半约叶林谈话。晚9时半见清华4个同学。（6）

可见，由周恩来进入清华过问文革运动是毛泽东在7月29日之前作出决定，在7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来的。可以合理地推断，不许中央文革到清华园去的那个“中央”，应该也是毛泽东，这一进一禁，应该是同时作出的决定，前者是在中央常委会上通过的，后者很可能是毛泽东私下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宣布的。

不许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而交给周恩来过问，笔者觉得这个决定背后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历史事件在发生后自然有很多人回顾，若是一件事没有发生，其背后的原因有时也值得后人注意，但是常被人们忽略。所以在清华师生关于文革的回忆中，对周恩来有许多记述，而中央文革在清华文革初期的缺席这一事实，在清华师生见诸文字的回忆中，似乎只有学生万润南注意到了，他在“文革中的清华岁月”中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4〕蒯大富的回忆回答了万润南几个的问号——那确实是毛的安排，明定的分工，也是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但是其他相关的问题并没有人讨论过。例如，毛泽东为什么不许中央文革同时过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而要把清华大学分离出来，留给周恩来去过问？为什么不是让中央文革和周恩来共同过问清华文革而是禁止中央文革进入清华园？毛泽东究竟有什么样的考虑？笔者在这里试图理解毛泽东的这个决定背后的“名堂”，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供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同仁讨论：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至少是目的之一——就是摧垮刘少奇司令部，而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初期受刘少奇的控制远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作组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1966年6月8日进驻学校的，人数有528人之多，堪称全国最大的工作组。工作组一进校就罢免了学校的全部官员，完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刘少奇直接过问清华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当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过大字报。〔7〕所以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文革的群众运动虽然是以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开局的，它的第一个回合将在清华大学这个角斗场展开。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等人，雪藏多年，政治分量明显比不上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江青虽有着毛夫人的身分，政治分量有余，但她初入政坛，历练不足，而且，毛应该了解江青的性格上的缺陷。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让江青在清华大学把斗争矛头指向王光美极可能给世人造成家族斗争的印象，这是需要尽力避免的。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成了过问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不二人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知道，斗争的焦点是工作组问题，周恩来曾是参与派遣工作组决策的领导之一，但已经放弃了支持派工作组的立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他来调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在党的高层将具有更高的公信力。而且笔者相信，毛的这一决定也是给周的一个信号：虽然你也参与了派遣工作组的决定，但是不会追究你。周也明白毛的信号，知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而是他要去清华对付的那个人。此外，毛不让江青掺和到清华的运动中去，也不排除是要考察周恩来在这场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总之，毛派给他的是一个不可推辞的角色。

此外，毛泽东决定禁止中央文革到清华园活动，或许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素，那就是江青7月25、26两日在北大群众集会上的言行举止让毛泽东不放心。这两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跟康生等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正式在全校的群众大会上亮相，参加了要不要撤销工作组的辩论。据当时的学生李杨杨回忆，她在会上代表三十一个同学发言，表示了对工作组的支持。“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三十一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及她的妹妹张少林。”接下来江青的行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她在大庭广众面前把关于工作组的话题转移到自己的家庭里，说“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她不承认张少华是毛家的儿媳妇，而且说张少华的母亲张文秋是叛徒。（8）江青这种怨妇一般的失态即使在当时的听众当中也引起了惊愕、困惑甚至不屑。北大哲学系学生周国平回忆江青在那次大会上给他的最初印象说：“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9）

万润南谈到当年从大字报上看到有关内容时说：“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4）另一个清华学生阎淮回忆道：“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噙的一声就哭开了。”（10）

江青的这番表演毛泽东是否知道呢？又是什么时候传到毛泽东耳朵里的呢？最近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提供了一些信息：据戚回忆，江青讲话的时候，他就坐在她的边上。“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他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16）戚本禹的回忆未必都可采信无疑，不过我们知道戚本禹至死都不悔追随毛泽东和江青闹文革的经历，这一段对江青不利的内容，如果不是确实发生过，他是不会记载下来的。这段回忆说明毛泽东在北大辩论会的当天晚上就听说了，而且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可以想象，他当时是何等恼怒，使他担心让江青到清华对付王光美，情绪失控说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来，岂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7月29日的纪律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决定的。

看来上述纪律在8月4日已经生效。据蒯大富回忆，这一天，“周总理带着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多个人，就是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到清华开现场会。主席台上是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谢富治都坐在那下面，……刘少奇没来。”（109页）他没说的是，江青也没有到场。但

是陈伯达到场了，所以，那个中央文革不能到清华大学的纪律明显是针对江青说的，甚至只是一时气愤之下对江青的“薄惩”。

因为是薄惩，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条纪律只是在形式上得到执行。中央文革的人虽然不进清华，却并未忽略对清华大学文革的关注。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的造反组织是1966年9月下旬成立的，在此之前，据蒯大富回忆：“张春桥看我独来独往，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138页）宋永毅在“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一文中说，朱成昭在访谈中告诉他，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朱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11）中央文革对清华大学的这些干预，显然都发生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

看得出来，“中央”当时是急切希望在清华大学开辟战场，把战火烧到刘少奇的阵地上去，所以，“中央”虽然规定了中央文革不能进清华的纪律，但是并不在乎让中央文革在清华校外同蒯大富接触。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应该是9月18日到20日三天在沙滩“红楼”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据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回忆，“这是一次少数派座谈会，毛主席让开的……会后，中央文革把会议记录送给了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毛的女儿李讷出席了会议。学生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朱成昭、蒯大富、谭厚兰和韩爱晶等人，他们都作了发言反映情况。韩爱晶说这是一次产生重要影响的座谈会，它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42页）

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红旗》13期社论是文革中的一篇重要文件，可以说，它起到了将学生运动拨转航向的作用。1966年七月末，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社会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大多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如八·一八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的多次盛大接见、“破四旧”和由此开启的学校内外暴力致死事件以及全国大串连等等。这些事件固然都是毛泽东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及其“造反有理”口号的肯定所导致，但是它们的矛头指向，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在观察了一个多月后，他决定扶植学校中在工作组时期受害较深的那部分学生，让他们冲锋陷阵，把矛头指向他发动文革的真正目标——刘少奇司令部。于是就指示召开“红楼会议”。

这个会议如此重要，它的召开在《清华蒯大富》和《王大宾回忆录》（12）中都提到了，但是对其内容，中央文革的人和学生代表都说了什么话，两本书都讳莫如深。倒是《王力反思录》中有稍多的记述：“这个会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开的。会议本来是王任重主持的，王任重没兴趣，改由张春桥主持。会上学生发言说造反派还在受压，说周总理和稀泥、折中主义。也批评了陶铸。张春桥没怎么表态，只是说我们回去如实向中央汇报。”

（2）

文革研究者卜伟华在其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中对于红楼会议后中央文革的讨论有如下记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

（指1966年9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因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召开，又称红楼座谈会。）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13）

卜伟华的书中记述了张春桥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所列举的学生反映的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总理“和稀泥”。王力的回忆里也提到了“学生发言说造反派还在受压，说周总理和稀泥、折衷主义。”人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哪个学生反映的呢？当时在场的学生领袖们，谁最有可能说这样的话呢？今天来客观地判断，笔者认为蒯大富有很大的“嫌疑”。我们看《清华蒯大富》一书里，蒯大富对自己在1966年8、9月份的状况的回忆：“8·24我在学校，我怕他们打，我躲在一个暗室里，他们找不着我。”（133页）“朱成昭、韩爱晶也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138页）可见他对自己在清华大学内的处境是很不满意的，觉得自己还在继续受压。而主管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正是周恩来，如果要追究原因的话，他自然会埋怨周恩来至少对他支持不力，没有使他从臭变香，因此说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也不意外。实际上，有这样观感的学生，也不只是受压制的蒯大富等人，当时属于多数派的阎淮在回忆8月16日周恩来召见他们时的讲话时，也认为周恩来和稀泥手法高超：“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10）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常理的推断。从另一角度说，蒯大富和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没有提及自己在“红楼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也不一定是他们有意遮掩自己的言行，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对那一段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因为在文革后，周恩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代表，相信蒯、韩等人在经历了监禁和反思之后也认同这一点，例如《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封面就是一帧蒯大富同周恩来的亲密合影，而不用他们心目中的“空前民族英雄”（蒯大富语）的相片。因此如果他们曾经在当年的会议上说过“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一类的话，也是一段让自己悔恨难堪的经历，从而下意识地在记忆中将它过滤掉。王力说，“会议记录当时整理出来了，有全文，……记录主要送给毛主席，这加深了毛主席自己对形势的判断。”（2）这份记录应当保存在中共的某个绝密档案室内，一时无法解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朱成昭和谭厚兰已经离世，除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以外，了解其内情的人已经不多。我们希望他们能在有生之年把这次如此重要的会议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从记忆深处沉潜出来，披露给世人。

同时，由于没有会议记录的原文，我们也只能猜测，蒯大富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在中央文革或明或暗的指示，要他在清华大学组织起一支队伍，准备好向刘少奇的司令部发动攻击。于是我们看到，在“红楼”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蒯大富在清华拉起了一支队伍，开始叫“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发展成全国闻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可以说，蒯大富以及其他造反派学生领袖在“红楼会议”的发言，同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相符，导致了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的发表，而他个人在清华大学的处境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真的翻身了，他的队伍也确实像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样，砸进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文革活动的要害地区——清华大学。

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不能去清华大学的纪律已经是名存实亡。中央文革的人同蒯大富在学校之外的联系已经十分频繁，把他的队伍视作召之即来的嫡系部队。不过蒯大富这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似乎还缺乏自觉性，他在成立了井冈山之后，觉得在北京没有什么事，还跑到上海、南京去串连的二十多天，期间还跑到上海的工厂里去跟工人一起干活。江青到处找他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158页）——这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结果。

而中央文革同蒯大富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应当是张春桥同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门内的单独谈话，据蒯大富回忆：“12月18号后，总机转电话说中央首长来电话。接电话后得知是一个中央办公室的人来的电话。……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张春桥走过来

和我握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个开间，外面一个明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套间里面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它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问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她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交给一个御林军一个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后来，大概是1990年，我去北京见到王力，他告诉我，张春桥1966年12月见我是毛主席的意思。”（163—165页）张春桥密诏蒯大富，是后来四人帮受到审判时张春桥的一大罪状。

看得出来，蒯大富不是那种善于揣摩上意的人，毛泽东需要派张春桥直接传话才使他明白自己的任务。于是蒯大富回到清华，掀起了北京市也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倒刘行动：（1966年）12月25日，东方欲晓，寒风凛冽，广播喇叭传出宏亮有力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五千余名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大操场，顿时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迅速集合好了。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井冈山兵团五路大军胜利会师在天安门广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168—169页）这个行动连续搞了好多天，一直搞到元旦。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点名打倒刘、邓的街头行动。

同时蒯大富还根据江青的指示，作刘涛的工作，要她站出来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线，并把刘涛的发言录音“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放。不管怎么着刘涛当时的这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影响很大。”“全知道‘清华井冈山兵团’打倒刘少奇了。这就是我们特得意的第一功，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170—171页）

这个功劳立刻就受到了江青和戚本禹的肯定和支持。江青在12月30日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专门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这就反映了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满意。江青在清华园里以胜利者的身份说出了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一番话，宣告中央文革在清华园“缺席”的历史结束，从此可以直接指导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了。同一天，江青除了鼓励蒯大富以外，也不忘在刘少奇的家庭里敲进一个楔子：她在清华园里接见了刘涛，拉拢刘涛，教育她站稳立场，“大义灭亲”，揭发刘少奇，刘涛很乖，接着就写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967年1月2日）的长篇大字报，表示“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14）

回顾这一段历史，笔者认为，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文革，原来是希望周在那里通过追究王光美以及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刘少奇和他的司令部并将其摧毁。同时，他立下了不许中央文革——主要是江青——插手清华大学的纪律，希望给世人看到，刘少奇的垮台不仅得到周恩来的认可，而且还是在他主导下实现的，从而留下全党团结一致倒刘的印象。

然而，他的这个计划不能说圆满成功。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一开始就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据蒯大富在“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一文中回忆，周恩来在8月1日同他“两次谈话当中，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15）这种“过问”方式同中央文革在北大的那种“主导”的风格大相径庭。例如北大辩论工作组的群众大

会上，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工作组的学生一边，讲话中还用了很多强烈的措辞，甚至还有上文所述的江青在辩论会上有失尊严的表演。而周恩来在为蒯大富等人平反的大会上只是说了：“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因此，我们应该把责任引导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在这里，周恩来把斗争矛头引向了自己，而不是王光美和刘少奇。同时，在平反和支持蒯大富等受压制的学生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压制对立派，而是说“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110—111页）

确实如有人在“红楼”会议上说的，周恩来是以“和稀泥、折衷主义”的办法来拖延和弱化对刘少奇的斗争。于是，等到12月份，眼看1966年将要过去，毛泽东终于自己出手，派张春桥秘密召见蒯大富，明确布置了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号令。当然，周恩来后来被指定为包括刘少奇专案组在内的中央专案组总负责人——终究也没有逃过被毛泽东拉上一起制造刘少奇冤案的命运。

注释：

- 〔1〕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3月。
- 〔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 〔3〕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 〔4〕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712e，2007年12月。
- 〔5〕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
- 〔6〕刘泉、刘才堂：回忆1966年夏周总理的亲切接见·编者附记，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 〔7〕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
- 〔8〕李杨杨：一场精心策划导演的戏——1966年7月26日的辩论会，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309a，2013年9月。
- 〔9〕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 〔10〕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 〔11〕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312b，2003年12月。
- 〔12〕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5年10月。
- 〔13〕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 〔14〕阎长贵：我看清华文革，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 〔15〕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
- 〔16〕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4月。

2016年5月13日

~~~~~

【痛定思痛】

《我们忏悔》前言



• 《我们忏悔》编委会 •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怀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

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割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

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心胸，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辱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 原载《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

~~~~~

【读史笔记】

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六）

(续 z k 1 6 0 6 b)

(二) 体制问题

文革的悲剧、惨剧，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高度极权国家体制下，才可能发生。在文革造神运动和全民杀戮背后，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党和国家不受监督与限制的权力之手的操纵。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结合的产物，其中“领袖主导，全党响应”就是体制的作用，而且是占支配性地位的。而前文讨论的“教育问题”，也是国家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大屠杀，也主要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如研究者所说，“‘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个结果和延伸”。〔73〕文革一开始，公安部长就下令，公安部门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违法行为，“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也就是说，文革造反中出现的暴力行为，都是在国家保护、鼓励，甚至唆使下发生的。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1967年的“二月大镇压”、“七月大镇压”，1968年“夏季大镇压”，“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对群众的镇压和屠杀，都是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如果把文革中的屠杀与死亡完全归之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民”行为，就会对国家体制的罪责，形成有意无意的遮蔽与开脱。因此，我们对“全民杀戮”的反思、反省，以致忏悔，都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将其推到极端，变成“人人都是罪人”，就有可能让应对文革罪恶负责的“真正魁首”逃脱正义的审判。特别是文革的真相并没有彻底揭开，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事实都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74〕我们的批判锋芒应该首先指向极权体制：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自然有自己的责任，但这样的参与是极权体制引导与强迫所致，我们对自己责任的清理，也是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体制的罪恶。〔75〕

本文一开始，还谈到文革中“媒体起到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涉及文革时期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一说。中国的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是有不同特点的。文革的特点就是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的结合。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破既定秩序，不惜将各级党组织扫荡以尽，以越过专制体系的中间环节，直接发动群众，对他认定的革命对象（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实行专政。而毛泽东和群众之间，又是靠媒体来连接的。毛泽东每有重要的战略部署和号召，都首先发表在媒体上，即当时所说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会有这样的记忆：报刊上一发表最新的“最高指示”，各派群众立刻上街游行欢呼，表示“拥护”，并立即变成行动。这样的“登高一呼，一呼百应”是最能显示文革专政的特点的。以“两报一刊”为代表的媒体，就不仅是传达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各地方的记者站还担负了收集情报，上通下达的重任，成了有力的专政工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革中的党报就是代表党，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与当时的人们一样特别相信报纸和书，认为凡被铅字印在纸上的就一定是对的”。〔76〕而另一位知青则反省说，他在文革中就是“顺着报刊的指引”，一路打打杀杀，今天指向这一

拨敌人，明天又转向另一拨“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77〕文革期间，媒体在党和国家极权体系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题目。

有研究者对这样的极权体系所建立的具体制度，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制造一个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队伍，和以他们的子女为成员的‘不可信任者’队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统治者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和一般群众之中清洗出一些人落入贱民队伍，又在贱民中树立一两个‘弃暗投明’、‘脱胎换骨’，为官方所器重的典型，使所有贱民怀着上升的希望。这种做法极为聪明与有效，它使大多数人谨小慎微、驯顺服从，生怕‘犯政治错误’而贻误终生前途。同时又使被压制者一心企求救赎而不至反抗”。其二，“制造出一个以政治监视为职业的政工队伍和一批平时专打小报告，政治运动一来就兴风作浪、罗织罪名、落井下石的政治打手”，这两部分人就构成了所谓“积极分子（左派）队伍”，成为体制的依靠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告密不仅不是可耻的事，反而成了一种美德，成了‘争取进步’的必要条件。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关键是看其是否‘靠拢组织’，这指的是勤于汇报自己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军营连队）都把群众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一头（左派）是驯服工具，也是政治打手；一头（右派）是遭受迫害的“阶级敌人”；一般群众（中间派）就战战兢兢生活在政治夹缝里。三派都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中。其三，“控制人的最基本的手段是档案制度。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个档案。里面详细记载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政治表现，以及政治运动中的结论。还有别人的告密材料。人们永远不知道档案里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它像一个阴影终生追随你，又像达摩克利剑悬在你头上，当你和领导发生矛盾要挨整时，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决定你要成为靶子时，档案中的材料就被抛出来，成为置你于死地的利器”。〔78〕——以上具体制度是落实到基层的，而且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在文革初期就成为人们造反的直接对象，烧档案，揭发告密者，冲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的“阶级路线”，都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也同时引发了各单位内部的激烈斗争，前文谈到的各派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都与不同人群对这些制度的不同态度（背后又有不同利益需求）直接相关。而在文革中、后期恢复与重建秩序时，这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建立起来，至今也还在发挥作用。

（三）人性问题

《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在广泛收集、记录了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以及让他战栗的“灵魂的虐杀”，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时，有一个分析：“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忌、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动力”。〔79〕在他看来，“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80〕——这是一个深刻、重要的概括。

我们在前文引述过的《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一个看客……》一文的作者，谈到当朋友被揪斗，“我当时是想要向前，却犹豫而止步”，原因在“我害怕”：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牛棚里，“我一心努力想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只有参与或容忍打人，才能免除被打的恐惧”的无情事实与逻辑，而“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一都可能迟疑、止步。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这“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应该是人的本能与本性，

现在却被无情地利用来威逼人们服从强暴，并参与其中，成为帮手。“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81〕可以说，整个文革狂热、狂暴，以致整个国家的强权统治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上的。如一位忏悔者所说，是“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了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文革的造神与杀戮。〔82〕

另一位知青在自省时则说：“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83〕这大概也是人的本能与本性。“避害”当然是出于恐惧，而“趋利”大概是出于私心。尽管文革大批“私字一闪亮”，其实许多人参与文革，都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即利益的驱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谈到自己“告发”同学的动因，其实只有一句话：“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84〕而另一位知青则说：“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是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85〕还有一位反省者更是坦言，自己违心参与批斗，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在那个时代，批斗会上“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立场错了，就会关系到能否入党、入团这样的“政治前途”，更会影响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等实际的利益。〔86〕如论者所说，极权统治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全面垄断，对人们的生存资源的控制。也就是说，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的基本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服从，就一切（政治，经济，物质）都有“前途”；不服从，就一切都没有，就会失去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以致生命。〔87〕在文革中，就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本性，把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垄断、控制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方面，用对不驯服者的生存资源的剥夺，来震慑人心；另一面，又用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引发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以此收买人心，达到对人的严密控制。同时，又将这样的欲望，用“革命”的神圣光彩包裹起来，即用革命的名义来谋取私利，满足欲望。而如一位知青在忏悔中所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88〕可以说，正是这样的“革命名义”下的人的欲望（政治、经济的实际利益，甚至性欲，其核心是权力欲望）不加节制的无限膨胀，导致了文革惨无人道的种种暴行。

我曾经说过，人的本性是有善有恶的，健全的社会总能够扬善抑恶，而社会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扬恶抑善。文革正是这样一个扬恶抑善的时代；而文革所张扬的是人的兽性（嗜杀性），所压抑的是人的神性（敬畏生命）。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反思“女学生打死女校长”事件时说：“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这是为什么？“如今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89〕当时只有14岁的一位山东的高一学生也反省说：“恶作剧本是顽童的特征，但欺负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他在文革中就是对那些被批斗者任性“捉弄”而“乐不可支”，被激发出的是心灵冷酷的一面。〔90〕另一位反省者则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而自己这一代，“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91〕这里揭示的，是文革青少年施暴的重要原因：这是“原始本性”与“洗脑教育”双重作用的结果。而“洗脑教育”的实质，就是将青少年的原始本性中的愚蠢与残暴，引向阶级斗争的轨道，利用孩子之手，残害自己认定的“敌人”，那些被横加“和党争夺下一代”罪名的校长和老师。这本身就是残酷和卑劣的。

人们还注意到，文革中的暴行大都是集体的，如一位当年的红卫兵所说，这是“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的负面的痕迹”，事情过去，“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92〕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对人性善的方面的利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两篇是老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的自述，他们都强调“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有足够的正义性，“我们当时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百当革命来对待的”，“以一种虔诚的心，跟着领袖去”打一场“圣战”，自有一种神圣感。年轻一代更把自己全部青春的激情，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都投入其中。但最终却发现落入了“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权力战”中，而且退不下来。这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发现整个文革就是个阴谋，一个个具体的“小阴谋”外，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但“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真的成了牺牲品？”〔93〕这正是论者所说的，“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94〕于是，就有了无比沉重的总结：“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过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95〕

（四）国民性问题

冯骥才先生对文革还有一个总结：“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96〕痛定思痛，就不能不引发民族的自我反省，尤其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反思。

首先提到的是：“文革闹剧并非如导演所言‘首创’，不过只是重演和强化了历史上有过的闹剧。王莽、宇文邕、武则天、洪秀全们，都曾自导自演过内容与形式极其相似的闹剧。迷信、告密、效忠、内讧、动乱、盲从，似与文革同台演出。甚至连宇文邕（北周皇帝）公开强迫和尚与尼姑性交的荒唐，都堪与文革中有过的勒令和尚与尼姑结婚媲美”，“历史闹剧自上而下，文革闹剧自下而上；无不由农民的非理性理想主义作基础”。〔97〕前文提到的“文革进行了两千年”的命题，〔98〕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谈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人的“奴性”，并且有这样的阐述：“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于是，奴化历史，奴隶风俗，奴性教育，奴科学派深入普及，时代相传，演成了根性。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扣头、请安、匍匐、唱诺、感恩……竟然数千年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奉成金科玉律。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也一代代尊为万民效仿的高风亮节。满朝皆是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尽为因袭苟安之顺民。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强权者一声令下，无不卑躬折骨以赴之。此乃国风千古”。〔99〕这样的千古国风，在文革中，更吹遍华夏，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扣头、请安”变成“早请示，晚汇报”；“奴颜婢膝的官吏”被称作“紧跟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好干部”，“因袭苟安之顺民”被誉为“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大人栽培”变成“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培养”，“小的不敢”变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一律视为“革命觉悟高”的表现，等等。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永远做驯服工具，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就永远“安全”、“稳定”，坐稳了奴隶，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100〕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心向往之的“太平盛世”。现在，它经

过革命的包装，成为文革所要建立的革命新秩序的实际内容，以后又经过“现代化”包装，成为现代“中国梦”，或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不管如何包装，建立“奴化中国”以实现统治的稳定的实质是不变的，文革就是建立这样的“奴化”秩序的重要阶段，其内在逻辑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中国从无宗教立国，而是以人代神”，〔101〕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国民性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新宗教”，是落实到人身上，成为“个人崇拜”。中国的奴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从本单位的领导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依附。文革中的个人独裁实际上是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的，因为在儒家传统里，皇帝之上还有“道”，所有的“忠臣”首先是忠于“道”，因此“忠臣进谏”的事屡有发生，皇帝也必须“纳谏”。但在中国的现代极权体制，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系，在文革中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人都要写检讨、认罪书，而毛泽东是从不像历代帝王那样写“罪己诏”的。〔102〕这样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是要求“奴性入心”的，不仅在政治上绝对顺从，而且要在思想、精神上，发自内心的驯服。这或许是更令人恐惧的。

不仅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鲁迅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既不“信”，也不“从”，而只是“怕”和“利用”，“只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都那么做”。因此，鲁迅把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中国人”）称为“作戏的虚无党”。〔103〕鲁迅这里所说，都点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其一，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有“怕”和“利用”。以此看文革时的毛泽东崇拜，表面上看似一切绝对“信从”，而且十分“虔诚”；但就如前文所分析，实际是出于“畏惧”，更是一面造神，一面把神当招牌，利用神。中国文化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实用主义，还有鲁迅这里说的虚无主义。毛泽东的文革“新宗教运动”最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中国国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在文革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证实了鲁迅的判断：“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104〕对照文革期间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能不感到羞愧吗？

其二，中国人最善于做戏。文革的种种效忠活动，包括前文所描述的学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开始或许还有点真诚，是一种“愚忠”；到后来，就越里越成为一种做戏了。这样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就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人格缺陷，以及谁也不相信谁，缺乏基本信任，不惜以恶推测人的人际关系恶化。或许这并非普通中国人所愿，但当人们终于明白，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大游戏，大骗局，在上当受骗之后，也都走上了伪善、以恶待人之路，并视为“自我保护”。

鲁迅还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105〕，中国的汉字可以说是世界最具有灵活性的文字，同一件事情，换一种说法，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说，“滥杀无辜”说成是“镇压反革命”；“告密”说成是“向组织汇报”；“揭发父母”说成是“划清界限”，就都合理合法了。文革学习会上的发言，大批判文章，充斥着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其实都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讲者、写者，听者、看者，个个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演戏，但却要一本正经地演下去，说破了，就是破坏“游戏规则”，反而会成为“公敌”。最令人发指的，是用革命的言词掩盖杀戮的血腥，像鲁迅说的那样，“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慌，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106〕

没有信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对精神问题的忽略，缺少“对彼岸世界的神圣向往”。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尽管文革中像滥用革命的名义一样，我们也滥用神圣的名义，但我们真正崇拜的是“物化的神圣”。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热心于在此岸建立“天堂”，进行“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文革的实践恰恰证明，此岸的天堂必定是地狱，正是人间净土化的努力，“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107）一个缺乏神圣感，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必然是既不爱，也不怕的。这是文革的大屠杀中，人们并不困难地就越过了道德底线的重要原因。前文谈到的杀害老师、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这类伤天害理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和既不爱又不怕、没有任何精神、道德约束直接关联的。

彼岸关怀的缺失，使得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地“现实”、“世俗”。这是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儒家是不谈鬼神的，它对非人间、非此岸世界的事情是回避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现世活着”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种“活命哲学”是可以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影响至深。儒家在人际关系中强调谦和，礼让，和为贵，本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背后，又有一个对既定秩序的维护的意图。这样就形成了以“忍”为核心的国民性格。一位文革的参与者说自己“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忍和善”，“忍字是心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108）所谓“忍”，就是忍辱负重，妥协苟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这是一种生命的惰性。有人说中国人只要还能“活下去”，不管怎么个活法，再窝囊也要维持现状，绝不思变革，更不要说反抗。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善”，不过是“无用”的代名词。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稳了奴隶，能够当顺民，就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但一旦“想作奴隶而不得”，就立刻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暴民。应该说，许多人就靠“忍”这样的内含奴性的生存智慧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的。

文革中，表现更充分的，还有中国人的“好斗”，即前文所描述的“窝里斗”，也可以说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这是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即论者说的“阴狠”：（109）暴戾，凶残，玩弄权术、阴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显然有法家的影响。我们是可以“忍”与“斗”来概括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的两大特点的。而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外儒内法”的张力结构的。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的“忍”与“斗”，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一般说来，都是对上、对强势“忍”，对下、对弱势“斗”。因此，鲁迅说，中国人即使受到“强者的蹂躏”，心中“蕴蓄怨愤”，也“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是最能反映人性的“卑怯”的。（110）鲁迅还指出，这样的“对上忍，对下狠”的国民性，又是决定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11）中国国民在这样的等级结构里，是有双重身份的：对上，是“奴才”，卑躬屈膝；对下，是“主人”，耀武扬威。由此形成的是“主奴互换”的双重人格，这在文革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受害者，既可以甘心为奴而获得暂时的平安，更可以在加害于他人中得到某种主人感（至少是自己还在“人民内部”的感觉），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而专制、极权统治也就这样长治久安了。

而且，还有国民性中的“健忘症”。这也是令反思、反省者最感痛心与无奈的：“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当然更有现当代的极权政治的严控——钱注），老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112）

于是，就有了包括本文在内的“拒绝遗忘”的努力。

权作结尾：“文革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最后，还是抄录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权作结尾——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的文革已然翻过去，不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那怕是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钱注）。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缘自文革”。（113）

2015年12月16日—12月29日看材料，2016年2月3日—2月18日写作

注释：

1.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2. 郝一星：《无罪的悔——文革回眸之一》，《我们忏悔》，第412页。
3. 《硬汉子》，《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3页。
4. 《复仇主义者》，《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84页。
5. 沙叶新：《“检讨”文化》，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5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
6. 沙叶新：《“检讨”文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57页。
7. 陈凯歌：《我是群氓的一份子》，《忏悔还是不忏悔》，第261页。
8. 丁珊：《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我们忏悔》，第337页。
9. 吴非：《“忠字化”小忆》，《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5页。
10. 荒也：《母亲，父亲和我们》，《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67页，第68页，第69页。
11. 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8页，第9页。
12. 《硬汉子》，《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2页，第263页，第264页。
13. 一般人都认为，这句话是林彪说的，其实，发明权应该属于毛泽东。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里公开宣布过。
14. 任国庆：《如果能够赎罪……——》，《我们忏悔》，第169——173页。
15. 林希：《恩怨》，《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47页。
16. 《绝顶聪明的人》，《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28页。
17. 见《红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1967年第10期（6月21日）。参看钱理群：《毛泽

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18. 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我们忏悔》，第122——123页。
19. “三家村”本来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笔名，六十年代他们以此笔名，发表总题为《燕山夜话》的杂文。文革一开始，姚文元就写大批判文章《评“三家村”》，抓住文章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攻击邓拓等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反党。姚文元的文章可以说是文革“阶级斗争想象力”的样本。
20. 凤翔：《我们被人“检举揭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102——103页。
21. 《笑的故事》，《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66页，第167——168页。
22. 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5——376页。
23. 郑白：《心的记忆》，《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137——139页。
24. 刘鹏：《“文革”轶事》，《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421——422页。
25.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一百个人的十年》，第46页。
26. 陆晓娅：《生命的暗夜》，《我们忏悔》，第114页。
27.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66页。
28. 张红兵：《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我们忏悔》，第283——301页。
29.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49——250页。
30.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66页。
31.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39页，第140页，第148页，第137页。
32.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一百个人的十年》，第49页，第50页，第53页。
33. 《死脸》，《一百个人的十年》，第57页，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
34.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09页，第110——111页，第112页。
35. 星竹：《文革随笔》，《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121页，第124页。
36. 刘洪：《猫之罪？》，《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89页，第90页。
37. 关圣力：《屠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22——23页，第24页。
38. 邢渤涛：《抹不掉的红皮鞋》，《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55页。
39.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48页。
40. 秦晖：《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301页。
41.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16页，第317页，第318页，第326页，第327页，第328页，第329页。
42.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37页。
43. 《复仇主义者》，《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79页，第280页，第282页，第284页。
44. 《苦难意识流》，《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01页，第303页，第312页，第313页。
45.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23页，第224页。
46. 《牛司令》，《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14页，第213页。
47.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71页。
48. 《走出疯狂》，《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80页，第382页，第385页，第388——389页。

49. 《没有情节的人》，《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49页，第352页，第354——355页。
50.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7页，第268页。
51.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67页，第68页。
52. 中英杰：《右派送伪乡长》，《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77页。
53. 《拾纸救夫》，《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14页。
54. 李霄明：《记我的母亲夏青》，《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64页，第61页，第62页，
55. 《前言》，《我们忏悔》，第7页。
56.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57. 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7页。
58.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25页。
5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7页，第16页，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60. 毛志成：《半生‘牛蛇’史，一世恩仇录》，《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第37页。
61. 参看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1966：我们那一代的记忆》，第11——12页。
6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
63. 张雁冰：《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我们忏悔》，第99页。
64.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页，第154页。
65.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40页，第41页。
66. 转引自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2页。
67. 陈凯歌：《我是群氓中的一分子》，《忏悔还是不忏悔》，第262页。
68.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69.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及演变》，第31页。
70.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及演变》，第110页。
71.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407页。
72. 吴琰：《病理切片一二三》，《我们忏悔》，第371页，第373页，第375页，第377页。
73. 宋永毅：《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收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第16——17页，19—20页，24——15页，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出版。
74. 秦晖：《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第33页。
75. 参看钱理群：《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第20—21页。
76. 张雁冰：《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我们忏悔》，第101页。
77. 刘齐：《见血及其他》，《我们忏悔》，第355页。
78.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152——153页。
79.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1页，第3页。
80. 冯骥才：《终结文革》，《一百个人的十年》，第7页。
81. 丁珊：《我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一》，《我们忏悔》，第340页。
82. 卢晓蓉：《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我们忏悔》，第258页。
83. 张华：《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我们忏悔》，第273页。

84. 老鬼：《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我们忏悔》，第345页。
85. 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我们忏悔》，第238页。
86.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懊悔》，《我们忏悔》，第49页。
87. 陶东风：《盲从与利益考量——读〈我们忏悔〉》，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88.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我们忏悔》，第181页。
89. 冯敬兰：《记忆的疮疤》，《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475页。
90. 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我们忏悔》第127页。
91. 高宜：《最黑暗的夜晚》，《我们忏悔》，第54页。
92. 胡健：《艰难忏悔》，《我们忏悔》，第140——141页。
93.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59页，第247页。第364页，第379页。
94. 冯骥才：为《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写的“点评”。《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60页。
95. 岳建一：《重铸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5页。
96.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页。
97. 岳建一：《重塑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7页。
98.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15页。
99. 岳建一：《重塑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8页。
100. 沙叶新：《“检讨”文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62页。
101. 岳建一：《重塑民族灵魂》，《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下），第847页。
102. 参看沙叶新：《“检讨”文化》，《忏悔还是不忏悔》，第65——67页。
103. 鲁迅：《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第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04.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105. 鲁迅：《逃名》，《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409页。
106. 鲁迅：《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页。
107. 蔡翔：《神圣回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262页。
108. 《说不清楚》，《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86页，第289页。
109. 岳建一：《重铸民族灵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第848页。
110. 鲁迅：《杂忆》，《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8页。
111. 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27页。
112. 冯骥才：《前记》，《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页。
113. 冯骥才：《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忏悔还是不忏悔》，第292页。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